

「福利国家」剖析



2.7
-2

“福利国家”剖析

傅 驪 元

贵州人民出版社

“福利国家”剖析

(理论) 骗元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印张 116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50

书号4115·160 定价0.77元

前 言

近几十年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本统治，适应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高度自动化条件下剥削工人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和它的理论家们，竭力鼓吹所谓的“福利国家”，推行一系列笼络人心的社会福利措施。他们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最先进的“福利国家”，视为“人间天堂”、“地上乐园”，他们说，在那里，从摇篮到坟墓，一切都有社会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据此大肆宣传，说什么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除了贫困”，实现了“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似乎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今已经变成了人人富裕的“福利国家”。

英国前首相艾德礼曾说：“福利国家就是铲除贫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过：“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说，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接近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人人繁荣昌盛的理想。”“6700万美国工资收入者不象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所描写的那样，是被践踏的群众。那个对资本主义的讽刺画像‘木犁’一样地过时了。”①

1978年，日本报纸上有篇文章也写道：“日本保障与学

①尼克松：《六次危机》下册第383—390页。

历无关系的收入，把收入的分配重点放在下层，实行职工的福利优先于企业的收益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日本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也已经成为出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终于建成了‘高福利(高收入)、低负担’的社会，实现了世界上罕见的无下层的‘高平等’的社会。”

然而，事实表明，以“福利国家”自诩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不仅没有根本消除剥削与贫困，实现“人人繁荣昌盛”，反而自身也陷入了困境。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财政赤字日益增大，政府入不敷出，无论是公债还是私债的债台都越筑越高，严重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已成为一种不能解脱的羁绊。昔日被竭力渲染的社会福利现已被政府视为沉重的负担。为了摆脱困境，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调整政策，决心向福利开刀，大砍社会福利事业。

应当对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进行一番剖析，以弄清它的本质。

目 录

前言	1
一、“福利国家”的理论渊源和基本思想	1
(一) “福利国家”与“福利经济学”	1
(二) “新福利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	6
(三) “福利国家”论——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11
(四) “福利国家”论的基本思想	13
二、“混合经济”——高额垄断利润的保障	20
(一) 什么是“混合经济”?	20
(二) “混合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23
(三) “混合经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38
三、所谓“公平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40
(一) 累进税扩大着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	40
(二) “高工资”并没有满足劳动者正常的生活需要	49
(三) 两极分化在继续加剧	72
四、所谓“充分就业”	75
(一) 什么是“福利国家”论者所说的“充分就业”?	75
(二) 失业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	77
(三) 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82
(四) “充分就业”的虚伪性	83
(五) 资本主义世界最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	87

五、社会福利措施不能消除剥削和贫困	98
(一)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98
(二) 羊毛出在羊身上	101
(三) 掩盖剥削的伪善手法	105
(四) “死了就有富余，而活下去却不够”	109
(五) 贫困远远没有消除	119
六、“黄金手铐”	124
(一) 缓和劳资矛盾的各种措施	124
(二) 改良主义消除不了劳资间的根本对立	137
七、困境中的“福利国家”	141
(一) 无情的现实	141
(二) 向社会福利开刀	149
结束语	169

一、“福利国家”的理论

渊源和基本思想

(一) “福利国家”与“福利经济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的剥削和统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失业工人日益增加，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能按照“老一套”替资本主义辩护了。慑于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垄断资本统治，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策略，以社会福利来安抚被激怒了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便应运而生。

虽然“福利经济学”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但“社会福利”和“福利国家”的思想在此以前早已出现。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面对当时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的形势，竭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鼓吹由国家通过法律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并把这种改良主义贴上“社会主

义”的标签。他们提出国家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全外，还有“文化和福利的目的”。说什么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促进文化、改善公共卫生、保护老幼贫病等社会目标。他们甚至把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普鲁士称为“人民国家”，把当时普鲁士国家的社会保险、税率改革和铁路国有化等措施吹捧为“社会主义”。由于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教授，经常在大学讲坛上宣扬社会改良和阶级调和，鼓吹冒牌的“社会主义”，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十九世纪末，英国以韦伯夫妇和肖伯纳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叫费边社的团体。“费边”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他以待机缓进策略而著称。英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以费边命名该社，就是想用这个名字来强调他们是革命行动的反对者，表明他们也主张采取费边的渐进的策略，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费边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鼓吹只能“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新的原则转变，社会改组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他们竭力反对用革命的暴力去推翻资本主义，认为由资本主义“滑进”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实行普选制和议会制度，
①在经济上就是对疾病、残废、老年、儿童及失业实行社会服务，建立相应的福利设施，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费边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目的。

尽管“福利国家”、“社会福利”一词来源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但是，“福利经济学”的直接前

驱者则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霍布森(1858—1940),他在二十世纪初就明确提出经济学要以社会福利作为研究中心。霍布森在1898年写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1900年写的《分配经济学》,1914年写的《劳动与财富》,1922年写的《失业经济学》等著作中,都阐述了“社会福利”问题。他认为,为了保证“最大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实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而这种干预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国家不仅可以通过赋税消除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老年抚恤金和比较充分的失业救济等“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而且还应该对一些企业实行直接管制,以便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然而,最先将福利理论详细阐发,并把它写成系统著作的应该算是庇古。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认为,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改进社会状况,因而经济福利是经济科学的一个主题。他于1912年出版了《财富和福利》一书,并于1920年扩展成《福利经济学》一书,从而创立了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说的完整体系。“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为“福利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为了适应英国垄断资本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从国内来看,英国经济出现长期停滞趋势;剥削阶级庞大的财富和广大群众的贫困的对立,由于世界大战而变得日益尖锐起来;从国际来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英国工人

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使英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自治领和殖民地加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斗争，大英帝国日趋没落，解体过程业已开始。这些情况不能不反映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来。“福利经济学”就是适应了当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产生的。它标榜“关心”社会福利，抹杀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妄图以改良主义的说教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以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

“福利经济学”的诡辩手法就是把资产阶级，特别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福利冒充为全社会各个阶级的福利，掩盖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社会福利乃是个人福利的总和，它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他认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多少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福利就愈大。在这里，庇古完全不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仅仅把社会福利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庇古又提出决定社会福利的第二个因素，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他认为分配愈平均，社会福利程度愈高。但是分配关系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国民收入的分配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图通过公平分配，消除收入不均，以增进社会福利，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基础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

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①因为它“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地、‘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②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的。“边际效用”一词首先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1851—1926年)所创。他们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所感觉到的该商品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即“边际效用”；他们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衡量价值量的尺度就是边际效用；人对某种物品的欲望会随其不断被满足而递减，如果这种物品供给过多，欲望可以递减到零，于是，这一物品的边际效用，从而它的价值也会随之递减，直至完全消失。这是一种从人们主观心理解释价值形成过程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是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庇古以此为基础，认为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贫穷阶层的货币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很大。与此相反，富裕阶层的货币收入很多，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小。也就是说，同一英镑或同一美元，对于穷人来说效用很大，而对于富人来说其效用则是微不足道的。把福利归结为效用和满足，实质上归结为人们的主观心理评价，这就否定了福利的客观性和物质基础，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泥坑。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在增加社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0页。

②《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会福利的幌子下，掩盖资产阶级加强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剥削的真面目。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但是，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而他们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所以庇古鼓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从而增加所谓社会福利，实际只意味着剩余价值的量愈大，资产阶级占有的利润愈多，从而资产阶级的福利愈多；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意味着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和贫困化的加深。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还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它在“收入均等化”的口号下，企图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信，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调节，改进税收制度，实行累进税制，就可以使贫富收入差距缩小，把从富有者那里征收的一部分税款用于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供贫困者享用，从而实现“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的“极大值”。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就无必要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了；作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变成了“全民福利国家”了。

（二）“新福利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

尽管如此，庇古的理论仍不能完全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又作了修正和补充，以所谓新福利经济学的面目出现。他们修改和摒弃了庇古提出的“收入均等化”的主张。如前所述，庇古关于“收入均等化”的理论，虽然是虚伪的，带有极大的欺骗

性，但垄断资产阶级也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一旦肯定改变现行国民收入分配的必要性，那就意味着承认现行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这对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新福利经济学家便把庇古收入均等化的思想排除在“福利经济学”之外。诚然，有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也谈论收入分配问题，不过已经把它搬到伦理道德领域，把收入分配视为一个道德评价问题，其政策由垄断资本家去决定。

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的，但两者又有区别：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之上，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建立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的大小可以用某种计量单位来表示，效用在各个人之间也可以比较，因此，把各个人获得的效用相加或总和，就构成全社会的效用，亦即全社会福利。序数效用论者认为，不能用具体数值表示某物的效用，但可以用第一、第二、……等序数来比较哪个效用大，哪个效用小，这种比较可以通过一个人对一物或另一物的偏好程度作不同的选择而反映出来。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根据既定的市场价格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只要每个社会成员根据各自的偏好，花费其收入，使他们获得的效用或福利达到极大值，就可以推论整个社会的效用总和或社会福利达到极大值。在这里，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抹煞了消费者及其偏好的阶级属性，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把价值归结为主体与物之间的关系，把主观心理评价视为首要的因素。

新福利经济学另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发展了“帕累托最适度”理论。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1848—1923年)，

十九世纪末曾在序数效用论基础上研究社会福利极大值问题。他从收入分配固定不变出发，对社会福利极大值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产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除非至少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后人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帕累托最适度”。长期以来，新福利经济学的大量著作都是进一步论证和发展帕累托最适度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归根到底与庇古的资源配置的最适度条件并无多少差别。新福利经济学的“最适度”理论完全是为了保证垄断资本利益和维护金融寡头的统治服务的。因为这种理论所要论证的就是在排除了收入分配任何变化的前提下，能使资本家的利润保持在极大值的状态。因此，任何的政策措施或社会变革，都必须保证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不能对其有任何损害。

新福利经济学还提出了另一个“原理”，即所谓“假想的补偿原理”。它的含义是：有些政策或措施，难免会使一些人得利而使另一些人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到总额超过了损失总额，那末，通过采取措施向得利人征收特别税金，以之补偿受损者，这意味着对任何人都没有不利而对一些人有利。如果补偿后还有剩余，则意味着增加了社会福利。这种“补偿原理”显然也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整个社会福利，在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根据资产阶级的统计材料，任何时候都可得出社会福利增长的结论。而且这里所说的“补偿”只是“假想”的，事实上，并不一定实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提高效率，所受的损失可在长时期内补偿过来。不仅如此，如果一种政策措施，尽管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只要它使国民收入总量有所

增加，也可认为是增进了社会福利。所以，这种理论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

新福利经济学还有一个新的地方，就在于它编造了一个所谓“社会福利函数”。它认为社会福利和一些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自变量包括每个社会成员所购买的产品和提供的生产要素以及其它各种可以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收入不同，各人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同，各人对效用的偏好和先后次序的排列也就不同。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极大值，就在于各种影响社会福利因素的排列组合，在于个人对各种排列组合的偏好。当社会福利这个函数值最大时，就达到了社会福利极大值，就是最优社会福利。这个理论认为，由于个人的自由偏好是决定最优个人福利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是随个人福利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要达到社会福利极大值，实现最优社会福利，政府应保证个人的自由偏好。此外，要达到社会福利极大值，实现最优社会福利，还应有“合理的”收入分配作为前提。不过，在这里，“合理”并非指“均等化”，因为这种理论认为，“收入均等化”不能保证不同偏好的人的福利都得增进，他们所说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乃是由某种道德信念去评价或由“超人”去决定，而这种“超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社会福利函数同补偿原理一样，都是抽象地谈论社会福利，把社会福利视为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而抹煞其阶级属性。尤其错误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论把个人偏好和自由选择作为决定最优个人福利的重要条件。谁都知道，在生产资料为资产阶级所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除了出卖劳动力，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外，那里还有什么“个人偏好”和“自由选择”，还谈得上什么最优个人福利和最大限度的效用满足呢？所以，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所鼓吹的最优社会福利，实际上就是保证垄断资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总而言之，和旧福利经济学一样，新福利经济学也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宣扬“福利国家”的有各种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除了福利经济学家外，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也是“福利国家”的积极鼓吹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提出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以解决失业问题，并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这就为“福利国家”提出了新的论据和目标。

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经济长期停滞和失业空前严重的困境。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完全失业者达到3000万人，这就迫使凯恩斯寻找“挽救”资本主义的新药方。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笼，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新的辩护理论。凯恩斯认为，就业人数和国民收入取决于社会总需求，而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他根据所谓的“基本心理法则”，认为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有一种倾向，就是它的增量总不如收入的增量那么大，因此，这就产生了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多的现象。如果投资需求不能吸收所增加的储蓄，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就要下降，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所以，凯恩斯摒弃了传统